

# 以西部韵味书写现代童话

## ——农民作家金吉泰童话创作略论

◎张锦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真正的农民当了真正的作家,很是罕见。

农民作家专门为儿童写作,更是少之又少。甘肃省榆中县农家金吉泰,务农一辈子,写童话一辈子。他,出版了14本童话书,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作家们还选他当了甘肃省兰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童话,来自本土,土里土气,浓浓的乡土味儿,切切的乡村儿童的心事儿、情趣儿,却又采取了现代派的魔幻、黑色幽默,有那么一点洋味儿。可是,洋得虚无,土得实在,让生活在广大农村、牧区的孩子在读书中有了一种感同身受、心灵共鸣。

这么多年,文学浪潮一波接一波,儿童文学也是避不开的。但,金吉泰既不随波逐流,也不抵触新的思潮,而是淡定从容,有自己的坚守和追求。因此,大浪过后,泡沫消失,他的作品像地上的泥土一样沉甸甸地在那里。人们都会惊异于它的乡土气质与众不同。他的作品,独具一种西部韵味,每个故事又很不一样,有以古迹、文物为题材的,如《铜环兄弟》《月牙泉的天马》《莫高窟的纤夫》;有以大西北风情、风物为依据的,如《黄河水车》《鸽子鱼成龙》《泥烧武士·虎头鞋》;有讲述大自然中花果草木的别样经历的,如《黄土仙桃》《外婆家的黑牡丹》《疙瘩妈妈》;有描绘百姓生活中朝夕相伴的动物们的各种生态的,如《骆驼羔儿》《圆胖清扫地雷》《小牛》;更有写新时代新科技热火朝天改造世界的伟大建设工程的,如《洮河龙穿山》《老爹的太阳灶》《微耕机下田》;有写新农村新气象与天斗与地斗的罕见植物奇迹的,如《厄尔尼诺和山药蛋》《红十字草》《瓜田故事会》。有意思的是,有的作品直接写小孩子的眼前生活,像一篇篇散文似的,可作品里的物儿鸟儿们个个能跑能跳能飞能说,令人觉得生活竟是那么红火热闹、鲜活有味,如《野炊》《郭小金的“报震鸟”》《十字街头的童话》……就这样,生活有多丰富,金吉泰的童话就有多丰富;世界有多繁盛,金吉泰的童话就有多繁盛。而更有意思的是,他所写的大人小孩、大兽小禽,大都住在他的家乡、或是在家乡所在的甘肃省,或是在甘肃省所在的大西北。他写他自己最熟悉的百姓生活;写他身处的当下社会、眼见的现实未来;写他日夜思考、殷切期待的新的未来。

在他的童话中,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与生动的新时代精神巧妙地融会贯通,日常的百姓生活状态与伟大的民族振兴事业奇妙地融为一体。由此呈现的童话幻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



儿童文学创作,具有蓬勃的、强大的、久远的生命力。

金吉泰在作品自序中写道:“在农村,天高地厚,到处都是童话。置身如此美妙的童话天地,就信手采摘,尽情收获吧!”这句话,是从作家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金吉泰不但非常熟悉和善于描写农村生活中小孩大人的形象和心里,而且无论多么平凡的人物与生活,他都从中看出了非凡、非常的属于新时代、新世代的美感和情感。

正是这样,金吉泰的童话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独具一格。

金吉泰,用自己独特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童话创作,用自己扎根生活的幻想构筑,以一种文化自信的姿态,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领域中践行党的文艺路线;以一种文化自信的理念,给一代代新人以精美的精神食粮,担当起培育新时代新一代的重任。

### 二

以人民为中心创作童话的金吉泰,心中只有村子里的大人小孩和他们的日子。他写村子里的山丘坡坎、泉眼溪流,写大地上的青草绿树、红枣黄梨,写农人爱牛养驴、盼雨蓄水,写孩子跟草木相识,与动物为友,都完全进入一种信手拈来、挥洒自如的神奇状态。作品中,农人能上天入地、能上飞云端、下潜海底,小孩能听懂鸟语兽语、能游遍林海树海;写人写事都无拘无束、无边无际,却又是真实正确、真切真诚。在他笔下,反

映生活始终是第一位的。巧妙的是,他能以幻写真,因幻显真,有奇有实,因奇更实。就以《小毛驴出国》来说,写那个走基层、跑乡下的画家,画了黄河石堤,矮柳、农舍和撒欢的小毛驴,淳朴、老实的小毛驴,因听信丹麦国来的奶牛的挑唆,一路追赶画家要美金。画家却同情小毛驴,带它出国。但画家仍不去大城市,专往海边给补网的渔民画像。画家的画稿堆得像小山一样,就决定返回祖国。飞毯载着他俩沿长城和黄河而上,稳稳落在那充满田园风光的小村里。画家却因耗尽全力而逝世,他把卖画所得的一部分给了小毛驴。小毛驴将这些钱买了松柏树苗,环栽在画家坟上。这个故事,就像一连串绚丽隐秘的梦境,写出了中国农民的质朴天然,也反映了东西方价值观念的迥然相异,传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了正能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作家用心感受时代的每一丝波动,因此,他不论怎样运用种种非现实的童话幻想的艺术手段,他的作品总是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性和现代性。强烈的现实性,始终是金吉泰童话的鲜明底色。

显然,金吉泰童话,以一种更艺术的或者说更具有艺术性的曲折方式,来表达作家的现实理解。在奇幻性与现实性的交汇交融中,注入一种儿童感兴趣的“意思”,“泅浸”一种儿童能感知的“意韵”,洋溢一种儿童可感悟的“意义”,使浅层的童话幻想构筑为深层的童话象征,从而呈现为童话的深邃的哲理性。这样的作品,富有艺术的张力,令小读者产生联想,产生对生活、生命的思索和思考。

值得更深入研究的是,金吉泰在以童话幻想构筑童话象征时所展示的超强的想象力和非凡的表现力。而所有这些,不是从国外现代主义文学那里学来的,而是来自中华各民族民间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学。他的童话题目,无论是土里土气的《乌鞘岭上车赛车》《火焰山来的白葡萄》,还是带点洋味洋派的《苹果姐妹去选美》等,都彻头彻尾有着强烈的中国西部文化的韵味,具有内在的现实主义品质。在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对于西部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崇崇壮丽姿态的敬畏,对西部地区每一个人、每一个小孩淳朴厚厚人性的尊爱;充满了对伟大祖国辽阔疆域的无比热爱。无论是历史的、现实的,中国西部文化才是金吉泰创作的根脉。显然,作家的超强想象力是他的爱心善心凝聚、提炼而成,是他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天然流露。

儿童文学的价值主要在于情感价值,童话是儿童文学中的最重要的体裁,更是如此。金吉泰的童话,揭示了童话幻想的本质。也让我们重新思索童话的意义,以及儿童文学的意义。

水的依赖和恐惧。“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是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水是农业的命脉,水对靠天吃饭的先民们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风调雨顺就会有收成,干旱少雨或洪涝灾害就会使人们面临饥饿,甚至是死亡。浩瀚的黄河给人以生命,同时在长久的水崇拜心理的影响下,赋予了人们黄河般坚韧的性格。李白的《将进酒》中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天—奔流汹涌、博大壮美的意象寄托了诗人的审美追求,与诗人的个性和人生感悟符合。弗莱曾经指出:“在原型批评中,诗人意识中的知识仅仅被视为他对其他诗人(渊源)的借用或模仿,也就是对传统的自觉利用。”“探寻肖亦农创作的踪迹,不难发现,他笔下反复出现的黄河意象不仅遵循了前人的创作传统,而且还赋予了生命顽强的品格。

弗莱认为“人与自然有着同构关系”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看到肖亦农笔下的黄河是生命品格的折射。水的一个特性是能方能圆,“器方则水方,器圆则水圆”,水的这种特性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表现出圆通豁达、随遇而安的另一性格特点。肖亦农笔下的这种个体生命的不惜抗争体现得更为突出。河路汉们的生活境遇不仅辛苦而且充满了危险,这样的职业特征致使他们在选择该职业时要慎重考虑,于是才有了二才老汉之于“我”“有娘没娘”的提问。选择了把跑河路作为谋生的手段,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与黄河进行正面的较量。此刻的黄河已经从意象的层面脱离出来,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自然物象,而生命成为它的对应物。我们看到在二才老汉的带领下河路汉们逃脱了险滩,渡过了跌浪滩,安全地运送了物资,但也曾因为遇到巨大的冰流子而险些丧了命……当瞎老明活活冻死在冰面上那一刻,生命的脆弱体现得尤为真切。然而,河路汉们并没有因为困苦而放弃生的希望,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与自然的抗争中造就了自己坚韧的品格。他们以近乎玩世不恭的态度迎接生活中的挑战,时刻准备着与自然的黄河展开较量。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孔子实际上说出了水给予人的智慧启迪与道德启示,即做人应如水。而肖亦农笔下的黄河意象在给予人生命的同时,也磨砺了优美健康的,如水般美好的品格。中国民间的俗语道中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语句,这正体现了劳动人民坚持不懈的追求。自然象与生命本体的同构关系在此已经变成了对立的双方,而在这种对抗中,生命的品格逐渐凸显。

### 人与自然的交互感应——黄河意象之于生命的情感

原型批评当中,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交互感应的关系。自然的意象成为感情的附属物,并伴随着情绪的波动而表现出不同的情

态,甚至会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物象,以此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思绪。而在这些强烈的思绪中,爱情是永恒的话题,是诗歌吟诵的不朽篇章。翻开我国最早的古诗歌集——《诗经》,最能引起我们心灵颤动的就是那一篇篇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歌。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爱情诗中大多都与水有关,都有对水的描写。《诗经》中的第一篇就是一首水边的恋歌:“关关雎鸟,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肖亦农也将笔下的爱情与黄河意象做了恰到好处的融合。

“开河风掠过,黄河这只沉闷了一冬的巨龙,拱起了黄金的脊背,抖落一身沉厚的铠甲,大声地跳动着泥浪,呼呼隆隆地膨胀了。”此刻的“我”即将结束自己的知青征程,像黄河一样,抖落一身的铠甲。但似乎我并不轻松,这源于我与“水女子”之间纯真的爱情。“我要走了,伴随着我的是铺天盖地的黄河大浪。”王国维说“以我观万物,则万物皆着我之色彩。”作者将“我”即将与水女子以及这片土地离别时内心的情感波澜投注在自然的物象——黄河上面,听到黄河波浪的翻滚,想象着黄河汹涌的咆哮,我们甚至能感受到作者急促的呼吸,这是由内而外情感的喷发。

而文中始终伴随“我”的水女子,就可以看作是黄河意象的衍生物。文学作品中有关水的女性的象征意蕴颇多。从《诗经·蒹葭》中“在水一方的伊人”到《红楼梦》中“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宣告。晶莹剔透、清爽洁净的水成了女性的象征。女性柔情似水,水恰似女性温柔的化身。《红橄榄》中的水女子洁净、淳朴、柔和,作者于潜意识中将女性与水作了极富诗意的调配,水女子便成为了我知青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和生存动力。她执意要自己来背柴火,怕柴湿,弄脏了“我”的衣服;她几年来坚持为我洗衣做饭,对我无微不至地关爱;我伤心难过时,她质朴的话语和充满怜爱的安抚令我着迷。水女子身上散发出来的女性光辉,笼罩着我,不断地给予我希望。于是,在母亲和水女子之间,我难以抉择:“我那可怜的妈妈哟,我又想起了水女子那火辣辣的大眼睛,在逼视着我。”我想自己“像一只风筝,可有多少条缠在一起的线在牵扯着哟!”

借助黄河意象,肖亦农用诗意的笔触唱出了一支永远忧郁的爱的赞歌。黄河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情感在其笔下演绎出生命之美,同时传达了生命之美。诚如荣格所说:“《浮世德》并非是歌德创作的,而是歌德为《浮世德》创造出来的。”其意义在于浮世德作为一个特定的原型,是在远古时代早就预先存在的,因而并非为歌德所创造,而仅仅是歌德将其表现出来而已。中国文学中自古至今,文人们对江河意象的描摹不计其数,在肖亦农的笔下,黄河意向更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促使肖亦农在其作品中反复确认并塑造了这个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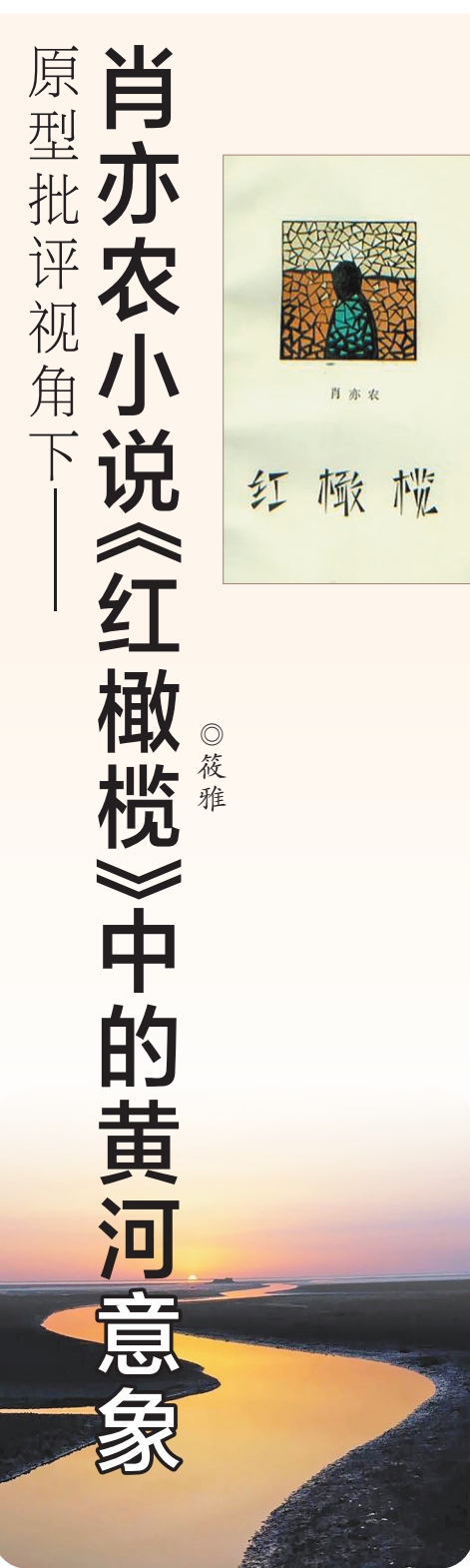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它在仰韶部落交游、夏商周朝代更替、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秦汉统一、南北朝民族融合中激流勇进,赓续至今,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之所系。黄河意象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脉络里,成为众多作家、诗人奋力书写的原型意象。弗莱在他的原型批评理论中认为一个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为一个完整的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家肖亦农在他的小说作品《红橄榄》中,在黄河流经的土地上深情描摹。在小说中的人物、背景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黄河意象被反复确认,这也承载了肖亦农的文学经验。“人类与自然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交互感应的关系,人们可以通过各种象征性的活动把自我的感情、愿望与意志投射到自然中去。”本文试从原型批评的视角论述肖亦农小说《红橄榄》中的黄河意象。

### 黄河意象与生命原型

在荣格看来,文艺创作的实质就是对早已存在的原型的激活,并赋予它以具体的形式。他认为,每一个原型之中都凝聚着人类心理的共同因素。它犹如一条不断流淌的心理的河,一旦遇到适合其表现的环境条件,就突然涨成一股洪流。《红橄榄》中的故事发生在红橄榄村——一个在黄河改道时甩下的泥滩上生长出来的小村庄,这泥滩上起着厚厚的牛皮碱,便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了。肖亦农在外在的黄河壮观景象的诱发之下,对生命个体包括自然生命在内,有着独特的理解和体悟,并且,他将此视为其构建文学世界的重要支撑点。

管仲在《管子·水地》篇中写道:“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可以说这片泥滩孕育了红橄榄村的人们,它不仅提供了他们得以居住的土地,还给予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跑河路。他们世代以跑河路为生,二才老汉曾十分惬意、十分自豪地向“我们”讲述了黄河第一舵的由来。河路汉们会偶尔在甲板上互相调笑,以此作乐。在这片盐碱地上,除了这一群生命的强者,还有与他们相依伴的红橄榄。这是能够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除了人类之外的又一富有顽强生命力的物种。这片土地孕育了红橄榄,除了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呼应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提供给人们制作工具诸如船、浆、舵把的材料……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红橄榄与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是在黄河的滋养之下,从孕育到诞生,而后生生不息的。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的紧密的关系,散发着生命的无穷魅力。

自古以来,人们在对水的属性的了解认识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丰富的审美心理体验。对水的审美心理是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河作为肖亦农作品中最典型的意象,内化为人的生命之



魂,与其作品中最核心的范畴“生命”融通汇合,借助黄河这个原型肖亦农得以直接观照生命本身。

### 人与自然的同构——黄河意象之于生命的品格

中国人对水的崇拜心理源于远古先民们对

内蒙古儿童文学作家许廷旺新作《小骑兵》塑造了一个崭新的草原少年形象——苏优格。在苏优格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王二小、雨来、海娃、小兵张嘎、潘冬子等身影,他们的英勇事迹激励着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上世纪30年代,日寇铁蹄踏入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觊觎着这片土地上丰富的矿藏和牲畜资源。苏优格和沃斯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他们的命运被一副失传已久的镶银马鞍捆绑在一起。这副马鞍由苏优格的祖上制造,由沃斯的祖上秘密收藏。沃斯的父亲宝格楚为日本人卖命,将镶银马鞍献给了日本宪兵队驻地最高指挥官井上清。苏优格的父亲巴根那不想为日本人做事,伺机逃走并加入了地下的抗日骑兵队伍。井上清又抓来了苏优格继续制作马鞍,苏优格只好假意配合,他在宪兵队地下工作者老侯的帮助下,参与并推动了地下抗日队伍的又一次胜利。最后,日军节节败退,井上清落得日暮途穷的自尽境地,那一副珍贵的镶银马鞍也留在了中华大地,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永续流传。

如果故事仅限于以上情节,《小骑兵》还只是一部普通的抗日题材儿童文学。在惊心动魄的抗日主线之外,一条波诡云谲的暗线悄然铺陈,将作者许廷旺擅长的悬念的精心营造和叙事的步步推进发挥到了极致。在小说的开头,巴根那一家救下一位奄奄一息的神秘男人,后来发现他叫佐佐木,是一个日本人。但他来到中国到底在找什么?他为什么天天痴迷于研究石头?在故事的后半段,谜底才如抽丝剥茧般呈现在苏优格面前:原来,他是一位被迫来到中国寻找矿藏的科学工作者。苏优格不知道父亲逃走后来在何处,而佐佐木也有一个和苏优格一样喜欢和动物做朋友的儿子。共同的思亲之情使得苏优格和佐佐木结下了近乎父子的深厚友谊。出于对巴根那和苏优格父子救命之恩的感激,佐佐木一次次暗中协助苏优格向外传递日军的机密信息,苏优格也两次救下佐佐木的生命,还提示他成功找到铜矿。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佐佐木这个中间人物的加入打破了一般抗日题材作品中二元对立的剧情安排和脸谱化的人物刻画,为作品增添了一抹人性的光辉,凸显了内蒙古儿女广阔和博大的胸襟和情怀。争夺马鞍的明线和寻找矿石的暗线的交叉设置,战争之恶与人性之善的对照反差使得小说的节奏张弛相宜,突破了一般革命历史小说叙事结构的单一模式。

不同于其他抗日题材作品与战争场景的正面对决,《小骑兵》将干钧历史之重化作成长少年之轻,细致再现了千万爱国人士不为人知的地下抗战事迹。苏优格从一个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普通男孩,到一个遇事冷静、智勇双全的“小骑兵”的成长过程,侧面渲染了战争的残酷与可怖。本该是天真烂漫的童年年纪,时代的动乱将这些不谙世事的孩童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作者许廷旺提到,这部小说有着真实的历史来源——“火烧五家子日本营”:“草原人为了抢回被夺的骏马,趁着夜色掩护,火烧日本营。当时,参与战斗的人员中最小的只有十六岁。”家乡孩童的英勇事迹激发了许廷旺的创作灵感,也使得他的人物塑造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突变式革命英雄”的创作窠臼。粉碎日军阴谋的重要行动共有三次:运走蒙古马、运走牛羊肉、运来大型开采设备。在前两次行动中,苏优格传递消息的行为是在无知的情况下碰巧完成的,而第三次最为关键,也真正触发了他作为一个少年地下工作者的潜力和素质,在亲人、好友和动物们的共同协助下,他们联手实现了转败为胜的局势逆转。一切看起来水到渠成,却在许廷旺笔下呈现为苏优格在关键时刻从犹豫、畏缩到机警、果敢的丰富心理变化,而促成这一心理转变的,无疑是苏优格对草原大地和祖国母亲的深挚的爱。

这种浓浓的爱意,透过人物眼中的草原风景进行了顺应人物心理发展的适时呈现。从春、夏、秋、冬再到来年春季,四季的轮回间,主人早已迎来蜕变。苏优格名字的汉语意为“芽”,“光”照耀下的草原正是孕育其成长的必备条件。《小骑兵》包含了对“光”尤其是阳光和霞光笼罩下草原美景的大量描写,营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情境,使得人物对草原大地的热爱更为真实可感。阳光往往伴随着人物心理的悲喜波动,有时,明媚的阳光让人身心愉悦,如苏优格在时隔一个多月终于走出日本宪兵队大院之后感受到了温暖的阳光;灼热的阳光也用来烘托宪兵队的压抑感和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霞光晕染下的草原美景则往往出现在人物陷入迷茫之时,苏优格帮佐佐木寻找矿石的时候注意到了落日映照下的石头,觉得似曾相识;后来他再次看到余晖照射下石头上的奇异闪光时,做出了及时的提示,佐佐木终于发现了久觅不得的铜矿石。如果说阳光照耀下明与暗泾渭分明的人间百态,对应着故事主线中善善恶恶对立的敌我斗争的话,那么霞光中的人物则流注于善善恶恶界限之外触动人心最深处的人情共鸣。“光”既是恒久存在的,又是风云变幻的,人心、人性何尝不是如此?“光”与“草原”已经融为一体,成了故事中人心、人性的永恒背景。

许廷旺的《小骑兵》延续了他人一贯的写作长处,如叙事节奏的控制、民族元素的融合、动物主体的介入等方面,同时在人物设置、心理描写、风景映衬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一方面,他能立足于内蒙古草原本土的历史和生活情境,将成长背景化,以“破解谜题”的方式推动少年在战火中寻找人生的答案;另一方面,他还大力提升了儿童文学的文化含量,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探究跨越国籍和物种界限的文化图景及精神家园。骑兵虽“小”,却折射了宏大而富有包容性的爱国情怀之光。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 《小骑兵》:照亮少年心灵的爱国之光

云 梧